

《色,戒》中的文本时间与张爱玲的“末世情结”^①

陈俊伊



摘要:张爱玲被认为是 20 世纪华文文学中最有才华、最具风格的女作家之一。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相比,《色,戒》中对沦陷时期上海的书写别具一格,甚至与张爱玲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也风格相左。张爱玲在《色,戒》中没有采用宏大的历史叙事策略,也不再关切庸常百姓在乱世中努力求存的生活图景,转而呈现了女大学生参加刺杀行动而命丧黄泉的悲剧与末世中繁华却又苍凉、夹杂着浓重失落感的上海形象。本文从《色,戒》的文本时间角度出发,剖析张爱玲作品中上海这一都市场域与挥之不去的“末世情结”的关联,同时思考张爱玲如何对沦陷时期上海形象的现代传统叙事进行瓦解,以及对乱世中女性自我表达实现的贡献性价值。

关键词:时间;张爱玲;上海;末世情结

The Textual Time in *Lust, Caution* and Eileen Chang's Apocalypse Complex

CHEN Junyi

Abstract: Eileen Chang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and styled female writers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Compared with other contemporary books, *Lust, Caution* depicts the image of Shanghai during the Occupied Period with a unique style, which differs in the styles of other Eileen Chang's contemporary works. In *Lust, Caution*, Eileen Chang did not adopt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no longer cared about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struggling to survive in troubled times. Instead, she presented the tragedy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assassination but died. The prosperous but desolate image of Shanghai in the wartime is mix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lo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background of *Lust, Caution*,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lingering “apocalypse complex” in Eileen Chang's work. At the same time, this thesis discusses

^① 本文系 2021 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色,戒》中的文本时间与张爱玲的‘末世情结’研究”(项目编号:N2021046)的结题成果。

how Eileen Chang dis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of the image of Shanghai in the Occupied Period, and analyzes how this novel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female self-expression in troubled times.

Keywords: time; Eileen Chang; Shanghai; apocalypse complex

1. 引言

《色,戒》开始构思于1953年左右,张爱玲花费20多年来修改完善,直到1978年才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色,戒》无论是对研究张爱玲的学者,还是对“张迷”来说,都是张爱玲的诸多作品中最贵重的宝石,堪称是极品中的极品。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香港与上海是互为指代的两个空间,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的双城记并不少见。但在《色,戒》中,作者利用时间线索将两年前的香港与两年后的上海收拢在同一个叙述框架里,把整个刺杀事件写入了一个非线性的时间顺序中,时间便成为一个关键要素。女主人公王佳芝仿佛被裹挟在时间的洪流中,时间在文本中成了看不见的力量,却又无所不能,将她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卡瓦拉罗(2013)¹⁷³曾在《文化理论关键词》中说:“我们把握时间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王佳芝不自觉的强烈的时间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着她作为一个外来者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知,她独自面对易先生体验刺杀行动的凶险,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一念之差将她推向了不可挽回、不可预测的末世。

2. 《色,戒》的历史时间

张爱玲曾在接受台湾作家水晶的访问时说过,她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大多“各有其本”。在张爱玲去世后,其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明确指出,确是“各有所本”。因此,《色,戒》也被认为是“有所本的”。学术界对《色,戒》的解读历来争议颇多。

但如马家辉(2008)所言:“张爱玲是专业作家,从听来的故事里抽取出血肉,从读来的新闻中勾勒出框架,然后,像烹调金华腊肠一样,把血肉贯注入框架里面,制造出一篇好小说。”

根据宋淇的论述,《色,戒》的初稿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即在张爱玲离开上海以后。此时的张爱玲虽然离开了上海,但上海的生活经历依然是她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色,戒》的整个叙事都收拢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上海沦陷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成为推动叙事以及人物命运发展的重要线索。张爱玲尽量虚化了故事背景,亦没有交代王佳芝的家庭背景。在《色,戒》中,张爱玲对历史的建构叙事“拒绝任何深层的结构或实证的意义”,其特点是“暧昧、混乱和颠倒无序”。(黄心村,2010)¹⁶³小说通篇没有交代太多人物关系的来龙去脉,描绘的语言也晦涩难懂,背景虚无缥缈,省略颇多,

唯恐交代太多。张爱玲转而将笔墨集中在麻将桌上,用最不经意的笔触、最轻描淡写的冷峻态度展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动。

小说以一场牌局作为叙事主轴,对于人物关系、故事背景的交代都隐藏在王佳芝与三位太太麻将局的对峙中。易先生一行人跟随汪精卫从重庆辗转香港出逃上海为一条时间线索,两年前王佳芝和她的同学们在岭南大学的话剧演出为另一条时间线索,王佳芝与易先生前两次约会的片段回忆为第三条时间线索。时间在小说中也不再被表现为一个直线发展的单一进程,相反,被打破成无数碎片。几个时间框架以错综复杂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叙事者的思想一再闪回,叙事时空在两年前的香港与两年后的上海之间跳跃。非线性的叙述方式,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并列与交叉,如同电影中“蒙太奇”的剪辑手法,打破了日常时间的顺序与持续。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手法,电影的叙事可以在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上取得极大的自由。张爱玲本就是电影迷,在她的其他文学作品中,能看到大量电影艺术技巧的运用。在《色,戒》中,张爱玲对“蒙太奇”的运用更是恰如其分、出神入化。文本中留下了大量的空隙与模糊、疑团,这也是张爱玲惯用的写作技巧,庄信正认为这是“西方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乔伊斯已经惯用的技巧‘藏闪法’”,文本中没有描写战争中常见的腥风血雨,也没有暗杀行动的刀光剑影,甚至连王佳芝被枪毙也只是一笔掠过,但正是这些留白与含混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猜想空间与解读角度,让人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当时紧张到令人窒息的诡异气氛。

小说通篇采用第三人称,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叙述,却在王佳芝的心理状态上耗费大量笔墨。在色诱易先生的过程中,在麻将桌上与三位太太的周旋时,王佳芝不自觉地带有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这太危险了。今天再不成功,再拖下去要给易太太知道了。”(张爱玲,2007)²⁷⁴ 张爱玲用大量篇幅细致地勾勒出牌局上三位太太的服饰打扮,却不曾详细展开故事背景与主题,字里行间仿佛在暗示什么,突如其来的“危险”也令初读者费解。张爱玲没有直指这一“危险”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交代何事的成败会牵扯到易太太。随着易先生的离开,王佳芝也“回到自己卧室里,也没换衣服,匆匆收拾了一下,女佣已经来说车在门口等着”(张爱玲,2007)²⁷⁴,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潜意识中推着王佳芝前行,每一次跟易先生约会都行色匆匆。

上次接了她去,又还在公寓里等了快一个钟头他才到。

上次车子来接她,倒是准时的。今天等这么久,想必是他自己来接。

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回事了。

第二次时间更逼促,就没提起。

(张爱玲,2007)²⁷⁶⁻²⁷⁷

王佳芝在几次约会中一直计算着、揣摩着时间,对易先生是否会准时赴约,她总在心里不停盘算猜测。“从心理学上来说,把时间划分为均匀的单元可以看作对付死亡知识的办法:似乎只要把那注定通向死亡的线路隔断,大限就会延迟。”(卡瓦拉罗,

2013)¹⁷⁶张爱玲关于时间文本的叙述策略,仿佛也在暗示王佳芝最终的命运走向。人的时间感常常是不稳定的,极易受到具体心理状态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异常慢。因为焦急而精神集中,王佳芝才会有“等最难熬。男人还可以抽烟。虚飘飘空捞捞的,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的恍惚,才会心神不宁。这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时间错觉使得王佳芝难以把握当下,也印证了卡瓦拉罗(2013)¹⁷⁶所说的“时间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统治着我们。无论怎样努力地衡量时间,划分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最终控制时间”。王佳芝对自己每一次漫长的等待戏谑式的自嘲,也深刻反映出当时的女性,即使是在约会偷情的私人公寓也同样受制于男性权威而压抑自我的生存现状,易先生有意或无意让王佳芝等待,实则是对女性身心的操控和宰制。

再这样等下去,去买东西店都要打烊了。

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

她又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的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张爱玲,2007)²⁷⁶⁻²⁷⁷

王佳芝始终带有不可推脱的时间意识,但她潜意识里明白不管自己如何处心积虑把控节奏,在与易先生的周旋中,她始终摆脱不了被摆布的命运,她也不过是老吴与她的同学们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的棋子。正是这种宿命的态度,才使得置身其中的王佳芝变得异常敏感,微小的细节都会被放大成“如同丝袜上一道裂痕”的“一种失败的预感”。作者从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末世意识”就好像一切都在“来不及了”的急促中发生。时间像助推器、催化剂般让王佳芝始终置身于行色匆匆、焦躁不安的紧张感中,始终投身于时间的急流中,这急流把她推向不可预知的未来。时间的逝去以及随之而来的“义不容辞”的不可挽回性也把她从香港推到了上海。在张爱玲笔下,“远行”似乎是她上海书写永恒的主题,在这场政治与情感交融的博弈中,读者能感觉到王佳芝对命运身不由己、力不从心的深深无力感。即使是行动开始,王佳芝依然会揣摩易先生究竟是否“不拿她当回事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常常会沉浸在爱情的幻想中,诸如曹七巧、白流苏,但她们心里又清楚男人不可靠,这也呼应了李欧梵(2010)在评论《封锁》时所提出的观点:“这里暗含了一个性别寓言,即‘正常的’时间和空间是由男人确立的,他们的历史直线演进观也左右了现代中国的国族建设大计。因此在她的小小说叙述结构里,通过让她的女主人公去争取克服男性主导的时间性,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借着她小说中的美学资源,也在试图超越她自身写作的历史境遇。”

与真实历史事件不同,张爱玲把暗杀地点从西伯利亚皮货店挪到了旁边的印度珠宝首饰店,选择在珠宝店进行暗杀,也更符合爱慕虚荣、想“敲竹杠”的情妇形象。此时王佳芝的内心比等易先生到来的时候更挣扎,竟有了“觉得是高坐在火药桶上,马上就要给炸飞了”的时间错觉,连楼下的橱窗也“随时都可以爆破”,只要“枪声一响,眼前的

一切都粉碎了”，如同末世般一切都会灰飞烟灭。这种幻觉反映了王佳芝内心的紧张继而转化为对现实的绝望，读者能从中感受到战争的隐喻性存在，也是对千钧一发的紧张时刻的比喻。不安、悸动的心理状态化成“太晚了”的嗟叹，也呼应了上文中“来不及了”的绝望心理状态。作者的“末世情结”在此处显露无遗，她对王佳芝挣扎、焦虑、害怕、压抑的心理状态绘声绘色的描述，可以被解读成一篇末世寓言。王佳芝与她那微不足道的爱情随着枪响都将走向毁灭与死亡，她无力抵抗。这其实是同样作为“逃离者”“远行者”的张爱玲内心无力和绝望的展露，也是沦陷时期的上海女性生存困境的微缩写照。作为上海的书写者，张爱玲对沦陷时期的乱世充满了深深的无力感。幻想是体现“末世”中人物内心压抑状态的具象展示，《色，戒》中也不乏似梦非梦的幻想书写：

战时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撒声喇叭。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搁在脸上。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

（张爱玲，2007）²⁷⁵

在张爱玲的笔下，现实的上海成了似梦非梦的空间，她以虚写实的精妙手法展露了王佳芝内心极度压抑不安的心理状态，预见性地描绘了这段漫长的折磨即将结束的恍惚之感，处于极端危险中的主人公仍感觉到像棉被般的“温暖”错觉，也象征着王佳芝企图排解现实生存环境中积压的不安与焦虑，同时塑造了一个荒凉、令人窒息的末世。

3. 张爱玲的“时间感”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张爱玲，1996a）张爱玲在短篇小说集《传奇》再版序中如是写道。乍一看这段奇特的呼吁是张爱玲对迅速成名的急切渴望，毕竟成名是她的夙愿。纵观张爱玲同时期的作品，大都洋溢着与《色，戒》“类似的紧迫之感，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将一切抛诸身后，要挣脱，要逃离，要表现出她的不甘不愿”（黄心村，2010）²⁶²，想要在“末世”占领一席之地并抓住稍纵即逝的时刻，这也是张爱玲在那个时代里最具个人色彩的时刻。张爱玲将个人声名与“末世”某种模糊的“荒凉感”联系在一起，这种对时间的论述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哲学意味。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1996a）

所谓“惘惘的威胁”，其实是人们无力改变的命运。“荒凉”暗示的是一种悲哀感，是对悲哀审慎的态度。张爱玲在这里传达的是一种迫在眉睫、箭在弦上的紧迫感以及力不从心、万般无奈的沧桑感。正是这种宿命的态度，使张爱玲预感到“更大的破坏”临近。当生存与死亡成了体验中心，作者笔下的王佳芝也是争分夺秒，即使作为上海的年轻“外来者”，却不甘做局外人，想要在乱世中实现“家国理想”。对于“末世”中浮世众生的生存境遇，张爱玲投入了深切的同情与悲悯，王佳芝即是张爱玲，张爱玲从王佳芝的遭际中体会到生命的虚无与卑微，并将之投射到王佳芝身上。

“末世”即是黑暗、无法预知、无法控制的乱世。面对末世，张爱玲迫不及待在世界末日来临前成全自己。即使是声名鹊起时，困扰张爱玲的始终是文明毁灭“这一令人沮丧的几乎末世般的图景”(张英进,2007)。正如王安忆(2003)所说：“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文本策略上，张爱玲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直接暴露了她的世界观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其结果就是她所塑造的文学世界常是“荒凉”的，遍布着毁灭、废墟的乱世书写。这种“末世情结”的形成首先来源于张爱玲对战争的真切体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陷落。突如其来的战争将血淋淋的世界呈现在尚在读大学的张爱玲面前，她的良师死于战争，使她对个人命运的沉浮有了更深的迷惘。被迫中断学业的她逃离香港返回上海，此时上海也已沦陷。战争对人类个体生命的操纵与裹挟，让张爱玲意识到在社会的动荡与兵荒马乱面前，在战云密布的生存环境中，每一个人都如同草芥般脆弱、渺小、悲哀，只能听命于不可知的力量，根本无从掌控个人的命运。因此，她才“得到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张爱玲,1996b)⁴⁰这是张爱玲对战争最真实的体验，也呼应了她“出名要趁早”的观点。此时比其他任何时刻都更迫切地需要写作、出版，不断讲述“末世”故事，因为战争随时可以摧毁一切声音。即使《万象》杂志主编柯灵劝说她不要到处发表文章，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要在“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张爱玲依然“等不及”了。她不顾友人的劝说，照旧以惊人的速度写作，毫无顾忌地在《杂志》(有汪伪政权背景)上发表作品，还“趁热打铁”将小说集交由《杂志》出版。甚至她笔下的王佳芝，在命悬一线的那一刻依然关心自己是否会因此出名。“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张爱玲,1996c)张爱玲潜意识里觉得若是再晚一点，上海的根基会在末日的分崩离析中都变成炮火的灰烬，只剩下断墙残垣的虚无。所以身在“末世”，个人的出名更重要。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描写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英法租界，对于从小就生活在上海都市场域的张爱玲来说，上海的文化与她的文学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香港求学的经历使她的小说场景偶尔搬到香港。《倾城之恋》即“为上海人写的”“香港传奇”。上海与香港在当时是中国殖民地色彩最浓厚的两大都市，资本主义最早在这里生根。在张爱玲笔下，显然“香港一直是上海的一个补充，在她小说世界中的一个‘她者’”。(李欧梵,2010)张爱玲将《色，戒》前半部分故事背景放在香港也印证了此观点。张爱玲是

一位具有典型“末世情结”“末世意识”的作家，她最擅长用荒凉的笔触描绘“末世”，除了《色，戒》，张爱玲也在其他作品中探索关于“末世”的主题以及时代毁灭的表达。这些作品中时常晃动着动乱的阴影，到处弥漫着毁灭将至的危机感和阴霾感。《倾城之恋》中，多次出现的意象——墙便是旧时代的遗物。靠在这堵墙上，花花公子范柳原用“地老天荒”去想象荒凉的世界末日，那时“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张爱玲，2009）¹⁸⁰ 只有到世界末日，他和白流苏若能再次相遇，才能相爱，因为在他看来“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张爱玲 2009）¹⁸⁷ 而在白流苏看来，范柳原这番说辞不过是想推托。如果感情非要等到世界末日才能确认，命运的威胁早已写在那堵墙上，即毁灭与死亡。李新民（2005）指出，“物欲、情欲、虚荣，对于人生一切物质层面上琐屑的计较、饱满的享受、热闹的追逐，正是基于精神深处对生命无常的恐惧，所以，才拼命想要攀住它们。生之喜悦和生之悲哀交织在一起，拥有与虚无彼此印证着，这就是张爱玲式的荒谬与苍凉”。对“末世”的恐惧与对未来的绝望，使得白流苏采取“活在当下”的现实主义生存态度，此处张爱玲传达的依然是“来不及”的“末世意识”。因为身处“末世”，所以白流苏才急于抓住范柳原这根“救命稻草”，恰恰又因为“末世”，范柳原才决定和白流苏结婚。张爱玲在此处巧妙地以反讽的方式来表达对乱世的批判与讽刺。都市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的传奇，张爱玲颂扬了这个在满目疮痍的“末世”中最终获得胜利（婚姻）的女性人物，却愈加凸显了女性在这个时代作为一名弱者的悲哀。

张爱玲文学作品中透露的浓重苍凉感以及悲观主义色彩，这与她的个人经历不无关联。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其父母皆出身名门。其母亲在她4岁时便远渡重洋出国留学，其父作为坐拥万贯家财的遗少整日沉迷于鸦片、堂子并再娶新妻。张爱玲曾因琐事与后母发生争执而被父亲毒打，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并将她监禁半年。从那时开始，张爱玲便对死亡威胁有了认识，也对人性的冷酷与亲情的虚伪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破裂的家庭、出走的母亲、冷漠的父亲给张爱玲的童年造成了极大伤害，构成了张爱玲“苍凉”的生命底色，影响并伴随她一生。对此，孔范今教授（1997）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家庭环境给予张爱玲的体验必然是双重的、分裂的：一方面那种众星捧月、悠游自在的生活使张爱玲比常人更能感受到一种实在的物欲的愉悦和温暖，使她更能理解琐碎生活中包含的生命情趣，这种体验形成了张爱玲思想中的世俗趋向与市民趣味；另一方面，笼罩着家庭的那种颓废没落、压抑、滞缓的气氛又使张爱玲切身地感到生活的虚无、荒诞以及命运的无常。”

在《色，戒》中，张爱玲隐去了王佳芝的家庭背景，即使王佳芝落得被枪毙的结局，也没人会惦念她。家人作为不在场者，如同张爱玲对她的亲人、家庭的感受，疏远而冷漠，她用文字揭露了内心生活的质感，投射到王佳芝身上便是“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的悲凉情绪。这种文学隐喻的运用有着纯粹的自我指代意味。不愉快的童年记忆决定了张爱玲成年后的心理走向与写作基调，她将这种悲观的人生态度与世界观寄托到笔下的人物上，借助人物形象的演示传递出来。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始终流露着的“末世情结”,无疑与“主流”中国传统文学基调不同,所呈现的上海故事也与茅盾等作家的小说有所不同。茅盾作为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责无旁贷地将爱国热情与民族使命感等主题融入上海书写中,始终以死亡、物资紧缺、社会动荡、革命作为统治性主题,以此来激发国人的民族气节。张爱玲则无意于对沦陷时期的众生相作出道德审判,也无意于政治,她对“旧朝新国”有种本能的疏离,同时,具有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人生姿态与价值观。身处“末世”的张爱玲强调的是个人的成败与得失,关注战争背景下个人的精神状态与生存处境。平安大戏院的霓虹灯照旧亮起,电车的铃铃声不辍不休,“冷气玻璃柜”中的“西点蛋糕”依然香甜……身处“末世”的每个人都绝望而渺小,每个人都想攥紧日常生活中细小的一切来抵御内心的恐惧与压力。在张爱玲笔下,“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1996b)¹³。

4. 总结

综上所述,在《色,戒》中,张爱玲以怜悯又讽刺的姿态关注女性在乱世中的焦虑、渴望与自我救赎。张爱玲笔下的《色,戒》跨越了国家、民族、责任、道德等现代传统战争叙事元素,将这些宏大叙事全都隐遁于小说背景之后。作者无意于呈现如“时代的丰碑”那样的作品,而是以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切入时代,使得处于“末世”的女性自我表达具有颠覆性意味。张爱玲以这种毫无英雄主义色彩可言的“末世”书写来精心描述沦陷时期的伤痛,实现了乱世中女性独特体验的自我表达。

参考文献:

- 黄心村,2010. 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M]. 胡静,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卡瓦拉罗,2013. 文化理论关键词[M]. 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孔范今,1997. 20世纪中国文学史[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946-947.
- 李欧梵,2010.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 修订本. 毛尖,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92.
- 李新民. 张爱玲小说的讽刺艺术[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76-81.
- 马家辉,2008. 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99.
- 王安忆,2003. 王安忆说[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321.
- 张爱玲,1996a. 传奇[M]. 大连:大连出版社:2.
- 张爱玲,1996b. 流言[M]. 大连:大连出版社.
- 张爱玲,1996c. 惘然记[M]. 大连:大连出版社:11.
- 张爱玲,2007. 色,戒[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张爱玲,2009. 倾城之恋[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张英进,2007. 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M]. 秦立彦,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52.

作者简介:

陈俊伊,女,1990年4月生,浙江绍兴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文学研究。